

在读

# 以记诵为根基的 笔墨训练

卢辅圣

历史上的“笔墨”一词所表征者，不仅是一个技法范畴，更是一个文化范畴。人们围绕笔墨运作的道进行的法理建设，构成了随中国画发生、发展延伸出来的一整套画学阐释体系中的最核心话语，而《画与绘：中国画笔墨生态》一书对此的剖析和梳理，从语言学角度提供了认知角度和阐释方向。

作为绘画史展开的两条主线，观念与形态的交替纠缠，推动着笔墨不断衍变。一方面，作为观念的笔墨是沉淀于民族心理的集体意识的体现，有相对恒定的内容；另一方面，作为形态的笔墨为满足实践主体开拓形式界限的需要，又不断落实为中国画史上形形色色的作品、风格和流派。而对于笔墨物质形态衍变、与笔墨内蕴密切相关的诸多精神阐释行为，作者始终将之放到与中国画发展历史语境相关的维度探讨。

有关象教文化的价值论阐发，构成本书论证过程的关键环节。盖象教文化之要义初不在象制之设立，而在于人文之化。所谓“人品即画品”“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人的价值论在这里之所以能够与绘画的本体论等量齐观，甚至凌驾其上，正源于中国传统文以艺术为载道之具的功能定位。作者将象教文化三种重要视觉形式——易象、书法、绘画的历史溯源梳理放到文化背景中探讨，并将重点落在“重画轻绘”这一形态学溯源的主线，为我们提供了笔墨作为精神承载不断作用于其物质形态的论证。

大批文人士大夫参与绘画，构成了中国视觉艺术发展史上的一道独特的景观。文人士大夫以一种“综合的”方式推动绘画史的进程，所调动的还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的整体文化素质，而文人画倡导的“三绝”“四全”，更是“士”阶层作为实践主体所强调的身份认定在绘画领域的突出反映。从“五彩彰施”到“水墨为上”，从“工、史之分”到“行、利之别”，从“诗画一律”到“以书入画”，从“有笔有墨”到“笔墨合一”，从“以形写神”到“似与不似”……作者站在开拓笔墨形式界限的角度，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作为“四民”之首对于中国画在物质与精神实践层面的双重形塑。

正如文人画时代的传承一样，笔墨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神承载正在日趋消解，这是本书篇末虽有所涉及但未充分展开的内容。所谓笔墨承传的命题只有在不断塑造新一代相似文化基因的实践土壤上才能成立，而今时今日，笔墨本来意义上的实践主体早已不复存在。笔墨的概念在古代曾被广泛用于阐释绘画对视觉呈现方式的信仰，其深在意涵也更多体现在文人画这种形态上，但在现代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的背景下，笔墨正逐渐剥离这层文化意涵，走向材质化、语言化，最终成为一种民族形式趣味的象征。

关于本书所及“粉本授授”的画学传习模式，此处尚有一点值得表出者：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以记诵为根基，再假以时日对记诵内容反复咀嚼、索引并应用的教育理念是一致的。这种“目识心记”的方式对于建立在“统观”前提下的笔墨训练非常重要，而在当前的学院教育中，由于受分科之学的影响，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观照方式的笔墨首先从观看方式上就被肢解，并由此深刻影响到笔墨的表达与阐释行为。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形态学还原”的历史进程，“笔墨”向“水墨”的蜕化或将日趋彻底，最终沦为纯粹材料意义的存在。然而大概也正是在这一话语背景之下，作者对于有关“形式界限与价值重塑”这类画学命题的思考，方才显出其对于中国画发展潜在的规整意义。

先生温州人，孙先生瑞安人，两人在杭大校园里留下关于家乡的佳话。1982年“文革”已然过去，夏先生执意要把“承焘”改为“晴涛”，虽然符合乡音，但内衷酸楚却只有通过这两位经历了阴霾的温州人交谈才能知晓。大学里的文史哲学者，结合自己的求学、治学经验，从这些文章中能读出很多东西。一个感受就是：学府里面的师生授受，既是一种现代教育的血脉传承，却也自然而然地洋溢着一种乡谊乡情。

近年来，有幸在温州问学访友时结识洪振宁、卢礼阳等先生。礼阳兄与编辑室同人编《温州读书报》很用心，联系的读书人多，投稿的作者也多。许多在上海和各地熟悉的朋友，如已故的陈梦熊、褚钰泉先生，都在《瓯歌三集》中出现，读来也是一番触动，一番伤感。这一段段或带苦涩，或含温情，或有惊醒的文字，应该是能够激活记忆，启发心智，重焕热情，砥砺前行的那种。

（本文节选自《瓯歌三集》序言。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第 479 期

# 瓯风氤氲中的人文精神

李天纲

说起温州，很多人想到的是“做生意”，这是几十年“温州模式”给人们的刻板印象，是偏见。学过一点哲学和历史的都知道，温州是大有文化的地方。宋代温州有“永嘉学派”，近代还有一群“经学家”“新学家”，在上海、杭州、北京都很活跃。温州的教育水平高，人才很多，不亚于苏、松、常、杭、嘉、湖，我有例子。“文革”后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任课老师中最多的是温州籍。李春元（瑞安人）老师给我们上世界古代史，赵克尧老师（瓯海人）上中国古史，许道勋老师（平阳人）上“经学史”，都是温州人。李春元老师是周谷城教授的学生，做过我们7914级班主任。历史系最重要的温州籍教授是周予同先生，和周谷城先生并称“二周”，分为“西周”（住沪西）谷老，“东周”（住复旦）予老。周先生是瑞安人，经学史大家，当过复旦大学教务长、历史系主任。周先生还是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当年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互为犄角。

温州人会读书，近代以来，出现了一大批读书人。温州不是省府城市，没有赶上1905年前后那一波大学设立潮。国立、省立大学既不开办，传教士苏慧廉无暇开办学，孙诒让、项湘藻、项崧等人主持的学馆、方言馆也没能升级成高等学校。于是，勤奋的温州学子就游走全国，在各地就学谋职，以至于后来有说法是“无温不成学”，还有“温州籍数学家”“温州大学校长”等现象。胡适编排早期北大的门户，认为在桐城派、章门弟子之外，还有一个以陈黻宸为首的“温州学人圈”。陈

黻宸是北大哲学门最早开设“中国哲学史”的教授，冯友兰先生听过他的课，还有过回忆。有这些根据，我和项宇在《兴文教以开风 尊先贤以继传统》（《温州日报》，2017年11月24日）的文章里说：“温州地区的现代化，并非是从1980年代才开始，而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由一大批乡贤人士举办新式文化、教育、市政、产业事业肇端的。简单地讲，就是由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宋恕、陈黻宸、项氏兄弟等倡导而来的。”在生意人走向全国、全世界之前，温州的文化人已经游走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乃至东京，留学东洋、西洋。我们今天谈温州，只说经济是不够的，还要说说它的文化底蕴。

温州文风重振，即所谓“永嘉学派”复兴，正是在清末同光年间开始的。瑞安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后先进士及第，且与曾国藩、李鸿章幕府有密切的联系。甲午战争以后，孙诒让、项氏兄弟率先在瑞安和温州全境举办新学，方言馆习外语，学计馆习数学。不少温州人士带着讲求变法的新派学问，顺着曾、李幕府的渠道，进入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的洋务事业，在讲求“新学”的教育机构的人尤其多。清末民初，温州“得风气之先”，在文教领域非常突出，人才活跃度在省内超过杭州、绍兴。宋恕教课于上海龙门、求志书院，陈黻宸以教育家出省长咨议局。清末“东瓯三杰”（宋恕、陈黻宸、陈虬）之后，民国初年又有一大批受他们影响的学子，如“瑞安才子”洪锦龙、薛钟斗、周予同、李笠、宋慈抱、李孟楚、伍叔俊、郑剑

西、许达初、陈逸人等涌现出来。我们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文化人，如郑振铎、夏承焘、朱维之、戴家祥、苏渊雷、夏鼐、赵超构、赵瑞蕻、黄宗江、南怀瑾也都是温州人。复旦大学前几任的校长苏步青、副校长谷超豪，都是温籍数学家。“不为五斗折腰身，归来去兮赋辞新”（苏步青《颂陶小咏》），数学家的诗句，也洋溢着东瓯文坛之遗风。

2010年，当地学人复刊《瓯风》，近年又得两位新人加入，延续了1933年瓯风社（刘绍宽、王理孚、黄迂、高谊、池志激、林损、孙孟晋、梅冷生、陈闲慧、李笠、李翹、宋慈抱、陈谧、张未嶺、陈准、林庆云等）的《瓯风杂志》（1934—1935）。这份名单呈现出一个地方学人团体的延续性和民间性。这两种地方特性，温州有，其他城市却未必有。和当年《瓯风杂志》弘扬“永嘉固有学术”一样，当代《瓯风》“立足温州，关注瓯越，打捞历史，温故知新”。浓郁的乡土意识和清晰的地方认同，和“世界温州人”（有“世界温州人博物馆”）观念如此融合，像足了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地方主义”（Glocalism），舒服自然。《瓯风》出刊至今，每年两册，已经超过了前辈的出刊数。瓯风氤氲之下的这一群学人，接续着东瓯文脉，传承着永嘉之学。

最近更有惊喜。卢礼阳先生把他主编的《瓯歌三集》传与我们，又令我感受到了温州文化圈的浓郁氛围。原来在《瓯风》之外，居然还有一个《瓯歌》系列，是温州图书馆办《温州读书报》文章选粹。全稿拜读

一过，再一次感佩于温州学人们对地方学脉的坚守和执着。《温州读书报》是1997年创刊的，每月出刊，从不间断。最近看到的刊物，仍然是几十年前朴实无华的样子。大概是用了市图书馆很少的经费，四开对折，天然去雕饰，密密麻麻，印上来的都是值得阅读的好文章。

《瓯歌三集》的文章，一如从前，全没有地方刊物不得已的吟风弄月感性文字，都是有关地方文献、人物、事件的研读、追忆和纪念，且都很有意思。例如，起首第一篇就是去年刚刚故去的叶永烈《〈味镜存稿〉序》，是为他的岳父杨梯（平阳人）编的文集序言。我们熟悉叶永烈的科普和口述历史著作，不曾想他岳父是留日回国，研究《资治通鉴》的文史学者。这一层翁婿关系，正是温州文脉的传承，说明了叶先生科学与人文相通的原因。石湾的《师恩难忘》怀念南大中文系赵瑞蕻教授、杨苡夫妇，也是情真意切。赵瑞蕻先生是温州城区人，著名翻译家，我们那一代人读的《红与黑》就是他的译本。赵先生出温州求学，由上海大夏而天津南开，抗战中在长沙、昆明、蒙自入西南联大，遇见过在母校省立十中（温州中学）教书的朱自清先生。得到前辈的教诲，赵先生矢志文学，发起“南湖诗社”，成长为翻译家。王来的《忆徐规先生》，回忆“文革”后入学杭州大学，与徐规先生交往的经历。徐规，平阳人，师从陈垣先生长子陈旭素，治宋史。徐先生在中大凭口音认出温州同乡，积极鼓励他继承永嘉学风，从事学术研究。孙崇涛的《我的签名本》写自己在杭州大学中文系承学夏承焘先生的故事。夏

# 蒋礼鸿与蓝田国立师院的青年教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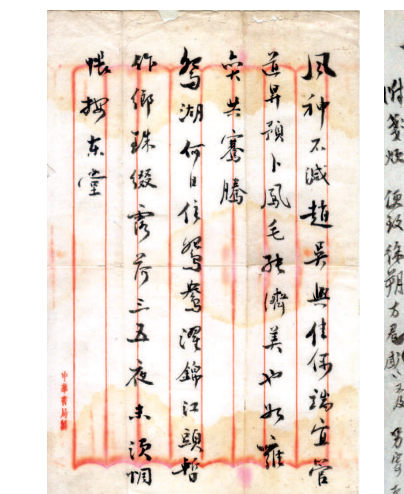
楼培

蒋礼鸿（云从，1916—1995），浙江嘉兴人，1934年由秀州中学保送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名之江大学），亲炙于徐昌（益修）、钟泰（钟山）、夏承焘（瞿禅）诸先生。1939年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留任国文系助教。其毕业论文《荀注订补》补，乃补直恩师钟泰《荀注订补》之作，马叙伦（夷初）撰有评语：“订正错简、句读处具见读书之细，释义亦有独到处。”当年夏天，已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执鞭的钟泰就函招受徒赴湘任其助教。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建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初址设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以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茂如）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任师院院长。廖氏敦聘钱锺书（子泉）、钟泰、孟宪承（伯洪）等多名宿学鸿儒在临任教，同时也延揽了一批青年俊彦充实阵容，其中就有钱氏之子钱锺书（默存）和门生徐承谟（燕谋）、吴亚森（忠匡）等。钱锺书本来已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时并入西南联大），此时迫于父命来湘待奉，心中颇怀郁郁，还平地起了不少波澜，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我们仨》等作品中已有记述，可参看。

蒋礼鸿《怀任斋诗词》卷二收入蓝田所撰诗词，不乏记载和其他青年教师们（即今日俗称“青椒”）交游往来之作，如《与中匡寻梅山中不遇》：“敬危踏尽却空回，疏雪寒寒未肯肯。此手须披荆棘，不须专为折花来。”蒋夫人盛静霞（弢青）注释：“吴忠匡，上海人。与云从在蓝田同事，交往甚密。”又有《〈白雨斋词话〉》赠中匡题此：“拓字分明自六诗，屈骚宋赋说徐文。吴郎自有灵珠在，不羨金朝乐府辞。”盛注：“《词话》称吴彦高为‘吴郎’。云从也称中匡为‘吴郎’，意为当今吴郎天赋甚高，更不用羨慕金朝吴郎的乐府了。”除了吴忠匡，蒋礼鸿诗中涉及其他青年教师，如《进退格依杨诚斋韵》：“吴郎钱子二徐翁，炉焰青来不论功。夷哉百城无剩壁，杀人一寸有奇锋。高谈歌与庞公略，匡坐真惭原宪穷？犹有春秋董狐手，会须诗境记提封！”钱子即钱锺书，二徐翁指徐燕谋与徐仁甫，盛注：“此诗系记与几位同事高谈阔论，自抒怀抱。认为当时局应当口诛笔伐，要学春秋时董狐直笔，毫不隐瞒地揭露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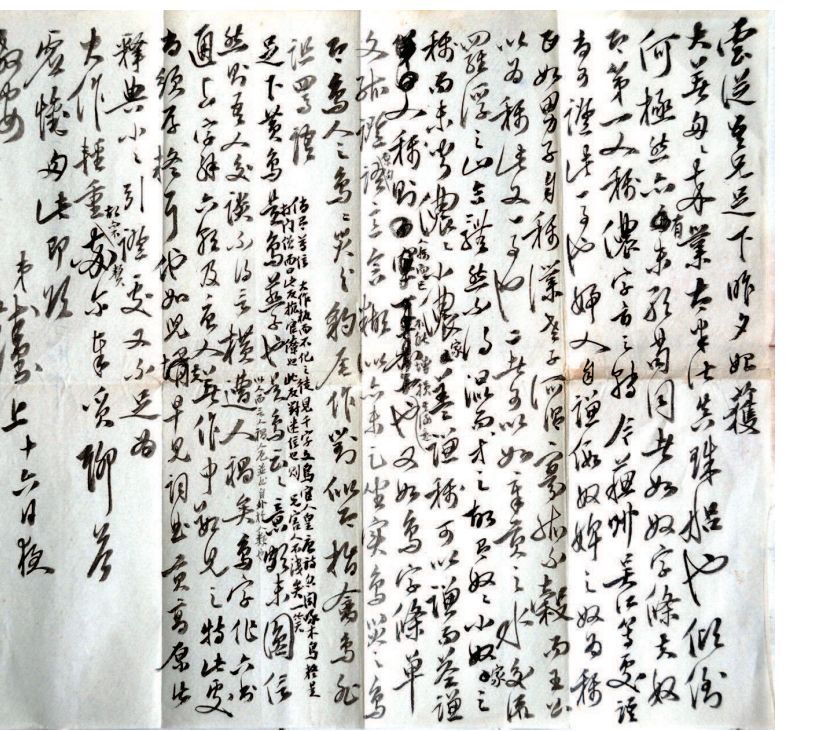
在蓝田国立师院任教期间，蒋礼鸿勤于治学，撰有《湘西读字记》，还在《国师季刊》上发表了多首诗词，又有《释任斋释克》《读韩非子小记》等论文问世，后来收入《新编诸子集



▲ 徐燕谋诗札



▶ 1959年，钱锺书致蒋礼鸿书札，探讨蒋礼鸿新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以雪为喻，落句云“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次韵奉答：“颇闻市悦莫如热，独此凌兢少取裁。世事那知心是水，诗人漫许格同梅。倘将千尺驱蝗吻，懒说盈仓兆富财。与失不恭宁守隘，敢持溽谓配恢恢？”盛注：“钱锺书先生以《雪喻》赠云从，认为云从洁身自好，可比冰雪，但也不应过于狭隘，应当随和一些。云从答诗，感谢钱对他的赞许，但表示不能同他的意见。”其实蒋氏虽然傲岸不群，特立独行，但又一心学术，谦逊淡泊，而钱锺书则目光如炬，有所规劝。

钱锺书1941年夏回到上海，开始“孤岛”生活。蒋礼鸿则因蓝田师院同事钱玘新（子厚）书信介绍，与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国文系助教盛静霞恋爱，翌年亦接获中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助教聘书，即向吴忠匡借得300元川资，离湘入蜀。1943年，蒋、盛订婚，次年吴忠匡寄来《贺蒋君云从定婚序》，小楷书写，端丽精美，雍容闲雅，落款钤有白文“吴忠匡印”，朱文“湊斋”，后者实由蒋礼鸿刻治。徐燕谋也寄以诗札，四首连贺。

抗战胜利后，蒋礼鸿随中大回迁南京，1947年偕妻任教复员后的之江大学，同年底长女出生，更添天伦之乐。他与蓝田师院旧友也保持联系，如有诗《余与溁青举借买书，燕谋有诗见调，答之》；在平日闲谈中亦有提及，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2年5月10日记载：“夕云从夫归来谈，谓钱锺书所为小说《围城》，写其父子泉

先生极顽固。云从谓钱书以小视视其父。”杨绛《我们仨》中讲到一个故事恰可与之对照合观：钱基博“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钱书不取诤谏，净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1959年3月，蒋礼鸿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行世，并寄赠钱锺书。钱氏读后有长篇回信，商榷纠错：

云从君兄下：昨日始获大著，匆匆卒业。夫半皆真珠也，倾倒何极！然亦有未敢苟同者。如奴字条，夫奴即第一人称依字音之转，今苏州、吴江等处语尚可见。此一事也。妇人自谦，假奴婢之奴为称，正如男子自称仆，《老子》所谓“寡孤不穀而王公以为称”，也。又如一事也。二者可以如章贡之水交流，罗浮之山合体，然不得混而等之。故有“奴奴”、“小奴家”之称，而未闻“依依”、“小依家”。盖谦称可以谦而益谦，人称则人称而已，不能增损其谦意也。又如鸟字条，单文孤证，原句语意含糊，似亦未足坐实“鸟灾”之“鸟”即“鸟人”之“鸟”。“鸟灾”之“鸟”作对，似即指禽鸟，非诅骂语。足下“黄

是鸟，燕子也是鸟”云云，意颇未圆。倘有尊信大作、执而不化之徒，见《千字文》“鸟官人星”，唐诗“忽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而曰此反抗官僚也，此反对迷信也，则见害人不说矣。一笑。信然则吾人交谈不得言横遭人祸矣。以人而言人祸、人厄，并非自外于人类也。鸟字条中数见之，特此尚须存疑耳。他如“儿夫”早见词曲，“贡高”原出释典，小小引证处，又不足为大作轻重，故亦不赘。率尔奉质，聊答虚怀。勿此，即颂

弟钱锺书上十六日夜

附笺烦便致徐朔方君，感感。又及。另寄夏鼐翁书一册，亦烦便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印行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蒋礼鸿亦曾寓目，后来在《“分茶”小记》《说博与精》《有关古代汉语学习的几个问题》等文中均对《宋诗选注》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困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分茶”的解释有所驳正。钱书以“分”为“鉴别”，蒋文则引周密《武林旧事》、杨万里《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等认为分茶乃一种泡茶的游艺。这种坦诚相待正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所致，完全不必介意。如蒋礼鸿亦曾对业师夏承焘以岳飞《满江红》词为明人伪作说抱持异见，作《瞿禅师论词绝句版行》，余得一册，有所献疑，书其后》诗、《说“贺兰山缺”》文加以质疑。而在给弟子《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作序时，又对其参考钱锺书《管锥编》论“落英”非“初开的花”表示赞赏。综观之，他们在学术上既能实事求是，虚己服善，又能博观约取，择善固执。

吴忠匡1954年起任教哈尔滨师范大学，1958年被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甫得改正。这一年吴氏携女往东南探亲访友，也与蒋礼鸿把臂晤面，再续前缘。然后到北京看望钱锺书、杨绛。吴氏走后，蒋礼鸿挥泪写下《中匡携女见过，留二日而去》：“一枝借了更奚求？请看闲庭瓜蔓幽。绝域风尘君竟至，卅年琐语话无头！从兹一去七千里，能得重来几许秋？挥手不须清别泪，中郎有女此何忧？”

1986年，钱锺书作《〈徐燕谋诗草〉序》，第二年，徐燕谋辞世。1995年，蒋礼鸿归道山，吴忠匡以左手书唁函致盛静霞，称蒋氏“聪明精粹，积学所得，著书满家，为国内有数之名家之一。再加上好的品德，善良的品性。诵其著述，想见人德，先生千古矣”。1998年，钱锺书故去，吴忠匡亦发去唁电，称其“聪明精粹，博见强志，是本世纪最大的天才”。2002年，吴氏也离开人世，与星散的往日友人重聚天上。

在蓝田，蒋礼鸿与国立师院的青年教师们相识相交，惺惺相惜，后又各奔前程，无问西东，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直到20世纪终结，但他们的诗词、学术和才情，并未随风而逝，而将永留史册。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